外国人笔下的中国春节

作为“百节之首”,春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不言自喻,也往往让经历此节庆的外国人弥久难忘。在东西文明交流互鉴日益频繁的时代,不同国家与民族的节日在其中“迎来送往”,被看在眼中、记在纸上、留在心间——春节是世界的。

利玛窦:明代新年灯节的耀目景象

作为最为中国人所知的来华传教士之一,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东西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与徐光启等人合译改变中国数学史的《几何原本》,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。

在中国的28载,利玛窦着儒服,习汉俗。他曾对彼时中国的一些习俗做了记载,收录在金尼阁所编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。其中就有对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——春节的记载。

利玛窦所记之事,实已至元宵时节。大街小巷点起的灯笼,在没有电的时代,不仅照亮了夜晚的黑暗,也点燃了中国人新一年的热情。

《中国图说》中利玛窦与徐光启的画像

“中国人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、全国各教都庆祝的就是他们的新年,举行庆祝是在第一个新月(指正月初一)以及还有第一个满月(指正月十五)的时候。这后一天叫做灯节,因为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、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,点得通明透亮。这时候,市场上也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灯笼,大家购买着自己喜欢的样式。屋里屋外点燃那么多灯笼,简直叫人以为房子失了火。此时晚间还有狂欢,一队队的人在街上耍龙灯,像酒神巴库斯的礼赞者那样欢呼跳跃,燃放鞭炮和焰火,全城呈现出一片彩色缤纷的耀目景象。”

——摘自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

马国贤:清代传教士笔下的康雍时期春节

马国贤是一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,受命于1710年来华,因擅长绘画、雕刻而得康熙皇帝赏识,成为随侍康熙的宫廷画师。马国贤在北京居住了13年,经历康熙、雍正两朝,康熙皇帝去世时(1722年)亦曾参加皇帝的葬礼。回到欧洲后,他将清宫中的见闻写成回忆录,其中也描绘了清代的风土人情、礼节服饰、山川景物。这部回忆录成为19世纪欧洲最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之一。

马国贤画像

以下这段文字,便是马国贤回忆录中对中国新年的记录。

在中国,一年之始使人想到了我们的嘉年华。新年庆祝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——游戏、盛宴、戏剧表演和其他娱乐。节日开始前几天,衙司都关门了,用官印封条把门封上,一直要到节日以后好几天才重新开门。图画偶像被粘贴在房门的门板上,在中国各地,大家燃放大量鞭炮,实在让人惊吓不已。我可以很有把握并毫不夸张地说:中国人辞旧迎新一晚上消耗掉的火药,要比全欧洲在十二个月里消耗掉的还要多。在旧年的除夕,孩子们跪拜他们的父母,幼拜长,弟拜兄,仆拜主,操演这个国家的风俗所要求的一切礼仪,包括了鞠躬、跪拜等,描述起来就太过冗长乏味了。丈夫和妻子,还有和各个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也奉行有各种礼仪,孩子对父母表达同样的行孝礼节,而父母亲们则在他们祖先的画像前面行孝礼。所有这一切,都是根据这个国家一种严格的古老观念,一种深沉的幼尊长的敬畏感而得来的。

——摘自《清廷十三年:马国贤在华回忆录》

恩斯特·柯德士:1930年代德国记者笔下的北京春节

恩斯特·柯德士是一名德国记者,1908年出生于中国,从小在天津长大,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北方话。其父海里希·柯德士为德国驻华外交官,曾任德华银行驻华代表;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。

或许是这样的家庭背景,让恩斯特对中国有别样的亲切感。他在193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、走访,写下了如风俗画般细致的《闲置的皇城》。

以下文段摘自《闲置的皇城》中《在北京过中国年》一篇,讲述恩斯特受邀到一位梁太太家中过节。

在中国,一年中也只有春节这一段日子,会有这么多人兴高采烈地在街上奔走。中国的新年要比我们西方的新年晚一个半月左右,即按西方的历法,在2月中旬前后。

春节,是全中国人最大型、最庄严神圣的节日。偌大的中华大地,家家户户都会以同样的风俗习惯举行各式各样的欢庆活动,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场景,人们都沉浸在热闹非凡、令人陶醉的喧嚣之中。

胡同两边纸糊的窗户都亮了起来,家家都传出欢声笑语。中国人认为,如果春节里高兴,全年也就会高兴,春节期间吃好穿好,全年就会不愁吃穿了。因此,人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,要制造快乐、看到快乐、拥有快乐。

春节期间,所有的四合院里、大街上、胡同口都会鞭炮声声、爆竹隆隆,好像整个北京城都在爆炸似的。实际上,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来自封闭的火药鞭炮,人们只是希望用它将妖魔鬼从住宅里驱赶得远远的。到处可见喜庆的男男女女、来回奔跑的孩子,到处听得到叽叽喳喳的叫喊声。

好一个欢快的春节北京。

梁太太四合院大门上贴了许多红色的纸条,上面书写着针对各种用途的祝福话语,还有许多红布条幅从屋檐上垂挂下来。佣人们今天也穿上了节日新装。数不清的各式小纸灯笼照亮着整个院子,灯笼上粘贴着各种不同题材的图案。每一块墙面都贴上写有“福”、“财”等吉祥字样的菱形红纸片,意味着幸运、福气、富裕和发财。从四合院进口大门到院内正房的房门、横穿庭院的长长甬道上,洒满了栗子壳、花生壳和核桃壳,人走在上面就会发出一阵阵“嚓咔嚓”爆裂的声响,这也是带来幸运和满足的象征。地上有多少果壳,就意味着吃掉了多少果仁。在新春佳节的这个月里,整栋房屋都不允许打扫,其象征意义是,所有的都不能“扫地出门”,要做到只进不出!

客厅里大约聚集了二十来个客人,个个都兴高采烈、喜形于色,没有一个人坐着。我们在一起闲聊、跳舞,并没有完全遵照传统的中国习俗,留声机里还放着流行的弧步舞曲。来宾们部分身着中式服装,部分穿西式晚礼服,男士们则一律西装革履。

一位中国客人对我说:“你们欧洲或美洲可能就没有这种节日,即能在民众中间激发起类似这种身心完全释放、喜气洋洋感觉的节日。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,它代表着新生、复活,代表着春天的来临。春天里,日月、阴阳、男女……结合在一起,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。春天里,万象更新,新的一年、新的一页以及完全不同于往年的新的形式,每个个体的生活也是如此。对于商人而言,希望新的一年生意更加兴隆,所有外债都必须坚决索回,所有的欠债也都必须尽最大努力还清。所谓生活的大书要翻开新的篇章,在新的篇章上,将引人注目地闪耀着两个孕育着新希望的词:‘幸福和富裕’。”

《闲置的皇城》封面

这位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述,语调中,似乎还包含着他的抱歉:“即便是最欧化的中国人,即习惯了西方基督教历法,已经将我们中国的老皇历弃之不顾的中国人,在春节这个日子也会敬拜祖先,特别是当他身在中国家乡,感受到家乡浓郁的精神氛围的时候。

——摘自《闲置的皇城》

彼得·海斯勒:20世纪末重庆涪陵的春节

彼得·海斯勒是一名美国记者、作家,生于1969年,曾任《纽约客》驻北京记者及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,中文名何伟。1996年,海斯勒加入美国“和平队”,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西南部的江边小城——重庆涪陵担任教师,教授英美文学等。

海斯勒说,涪陵是他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,也是让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。后来以此经历写作《江城》时,甚至会梦到涪陵、并眼含泪水地醒来。

《江城》出版后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多年,与海斯勒后来出版的《甲骨文》《寻路中国——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》构成其“中国纪实三部曲”。他本人被《华尔街日报》称赞为“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”。

以下为《江城》中《农历新年》一章的节选。海斯勒受邀到一户涪陵人家吃年夜饭,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下这次节庆经历,也记下了他与涪陵朋友彼此间的善意。

春节的前一晚,“学生食家”(当地一家面馆)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。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,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——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。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,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。

桌子上摆了几样肉食,全都非常麻辣,以及豆腐和豆芽,此外还有从城里的市场上买来的一条鱼。我们就是连吃上三天还有余。当然,也有米饭,王朝素给我的碗里舀了一勺。

“我晓得你们喜欢一开始吃就要有米饭,”她大声说道,“我们中国人不同,我们喜欢先吃菜后吃饭!”

她的厨艺很好,做出来的年夜饭更是绝世无双。间或,王朝素会大声说道:“难吃死了!”而我总会让她确信,饭菜的味道其实好得不能再好了,然后她又会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饭,并大声说道:“慢慢吃!”

吃过年饭,人们又坐回到沙发上,我也跟黄凯玩了起来。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,现在跟我来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车,还不时发出咯咯的大笑声。

我们坐在那里,一起看电视。一只盘式电炉烤得我们十分暖和,男人们还用它来点燃香烟。电视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时精彩一些。我现在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,不必批阅学生们的试卷,这个节假日带给我的沮丧感顿时一扫而光。

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,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。他们早就知道,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,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,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。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。我不知道,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,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。我知道,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,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。一想到这些,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。为我自己,也为别人,我都会这样做。

但今晚的宴请没有任何意图。他们知道,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,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。除此之外,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。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,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。

——摘自《江城》

(文字整理:李晗雪 王宗汉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)